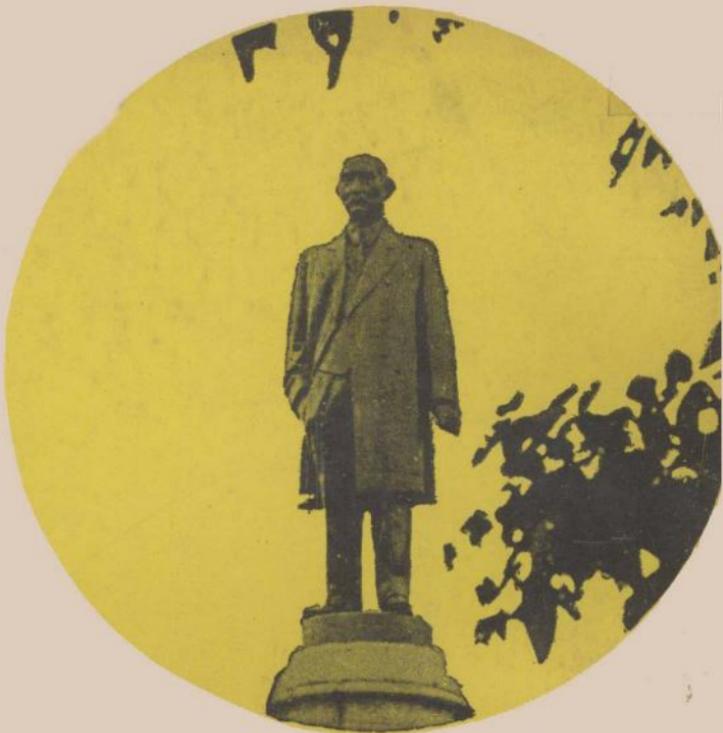


國父思想之研究

羅剛著



輯二第 書叢紀念年百父國
編主所研究義民主三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獅幼

羅剛著

國父思想之研究

三民主義研究所主編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四三號

著者：羅剛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二七三七號

印刷者：華信彩色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每册定價：四元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再版



序

本年——民國五十四年，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周年誕辰，爲紀念這個創造中華民國和爲世界開拓新機運的大革命家與大思想家，三民主義研究所特編印這兩輯紀念叢書。國父誕生於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清同治五年丙寅，即西曆一八六六年，到本年——一九六五年適屆百年。這一百年正是東方我國與西方國家文化思想積極轉變與交流的時代。國父之所以要繼往開來，融貫中西而創立一新的救國救世主義——三民主義，這不是偶然的。在國父誕生前七年，一八五九年，西方同時出版了兩部最著名而影響全世界的著作，即達爾文的種原論與馬克斯的資本論，而且美國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也在這一年出世。這三人的學術思想，不論爲害爲益，均在國父誕生後百年內成爲動搖世界舊社會的潛力。在國父誕生前一年，那個以民有民治民享解釋民主主義的林肯總統，因主張釋奴被刺而受人崇拜。這些外來的思想對於我國文化學術的刺激，那當然是不可能避免的。然而國父對於西方的科學哲學，固然有所規撫與吸收，但他却有取有捨，對於東方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墨的學說雖也有所繼承，但他却有去有留。而且他更能以我國的中和中庸之道，鎔鑄創新，建成一最高深最精微的學術系統。例如他的心物本一的元學論、民生重心的歷史論、仁愛基礎的社會論、濟危扶傾的民族論、權能區分的政治論、五權分工的憲法論、社會價值的經濟論、手腦合一的教育論、知難行易的實踐論等等，這些學說都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獨創的。

本所編印這兩輯叢書，均請專家研究執筆，欲以最簡明的文字，闡發 國父以上各方面學術思想的精義，總計二十四冊，每冊約十萬言，都二百四十餘萬言，分兩輯次第印行。惟 國父學術思想過於廣博，叢書內容，欲應有盡有，力有未逮。而黨內濟濟多士，亦以書目有限，延攬未周，勢所難免，但本叢書仍不失爲前所未有的創舉也。兩輯叢書爲本所張鐵君先生主編，一年以來，無間晨昏，精力悉瘁於此。又承幼獅書店主持諸君，竭力合作，負印刊發行之責，使本叢書如期問世，特此致謝。

三民主義研究所謹序 民國五十四年革命先烈紀念日

目錄

第一章	開創新世紀的革命導師 ······	一
第二章	現在正是三民主義的世紀 ······	一三
第三章	三民主義思想的根本問題 ······	四二
第四章	戴季陶先生對三民主義思想的研究 ······	七九
第五章	胡展堂先生對三民主義思想的研究 ······	一〇八
第六章	評周佛海三民主義思想的研究 ······	一三五
第七章	總裁對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啓示 ······	一六八
第八章	民族構成條件與民族精神的研究 ······	一九三
第九章	三民主義與馬列主義人性觀的比較研究 ······	二二三

第一章 開創新世紀的革命導師

在芸芸衆生的人海中，每天正不知有多少人生或死，其生其死，默默無聞，生命等於曇花一現，在人世上不留一點值得紀念的痕跡。但是一個偉大人物的生或死，却對人世有廣大深遠的影響。古人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似乎更有意義。國父孫中山先生之誕生，正是重於泰山。

國父於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清同治五年十月十六日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生時亦與平常嬰兒一樣，並無異象，但從他一生對民族國家社會人羣的貢獻來看，乃是為中國為世界開創新紀元的偉大人物。他的誕生，為我們中國和世界帶來新希望和新創造。不過從國父一生艱苦奮鬥革命歷史來看，他的誕生正如耶穌的降生一樣，都是為博愛犧牲受苦而來，都為救民族救世人而來。所不同的。耶穌把博愛犧牲表現在宗教方面。國父却將博愛犧牲表現在政治方面。耶穌是偉大的宗教家，而國父且是偉大的革命家。在宗教方面耶穌的影響是深遠廣大的，然而在政治方面 國父的成就，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無古人，就是在近代世界政治史上，亦無人堪與比倫。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時勢造英雄的事情很多，至英雄造時勢則很少。國父乃是二十世紀造時勢的巨人。歷史家研究 國父的革命歷史，誠然可從先生誕生的時代背景，說明救國動機及其成就，但無法解釋 國父三民主義革命的鴻圖。同一時代背景，為什麼前有洪秀全，後有

康有爲？爲什麼洪秀全的革命，不能倣屣帝王的尊崇？爲什麼康梁的保皇運動，尙充滿了媚事異族及君臣的思想？又爲什麼國父獨能衝破舊時代的藩籬，滌除數千年來專制政體的遺毒呢？這已無法說明。如果再進一步來研究三民主義對新時代的影響，爲什麼三民主義爲國父所發明，自難從時勢造英雄的觀點獲得解釋，可見國父並不爲時代所束縛，正因爲不爲時代所束縛，才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開創時代的新紀元。

一、爲中國開創新紀元 國父的造時勢，可分兩方面：一是爲中國開創新紀元；一是爲世界開創新紀元。茲分別說明。

所謂「新紀元」乃是指開創時代的事務標誌。研究國父一生革命成就，爲中國開創新紀元的大事有三：一爲首創國民革命運動；二爲首創國民革命黨；三爲首創中華民國。此三件大事，均爲中國過去所無，至國父誕生始帶來種子。其後經過國父的創導奮鬥，然後開花結實。

(1) 首創國民革命 中國自古以來，祇有帝王革命，沒有國民革命，國父爲中國歷史上首創國民革命的革命家。中國政治革命，始於湯武。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亦僅對湯武而言，其後羣雄起時，逐鹿中原，互相砍殺，終定於一。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而人民受專制帝王的犧牲與痛苦，亦代代不絕。可見自家天下以來，帝王已成不祥之物，專制政治已成人民的枷鎖，可是數千年來，均認爲帝王神聖，竟無一人敢明日張膽，主張廢除此不祥之物。直至國父革命，始首揭國民革命，以永

絕帝王革命，而造成國民革命的新紀元。

(2) 首創國民革命黨 首創國民革命與首創國民革命黨，自屬相應而生，但亦有區別。前者為政治主張之號召，後者為政治團體之實施。中國數千年來在專制政治統治下，決不允許政黨存在。至於革命黨，更是大逆不道。因而士大夫的傳統觀念，亦是「君子羣而不黨」。但是 國父不僅是革命思想家，同時亦是革命實行家，他的倡導國民革命，就是要實行國民革命，而實行革命，必自組黨開始。

國父組黨始於清光緒二十年，亦即甲午戰爭一年。首創的國民革命黨為興中會，當時參加會員不過百餘人，而且是檀香山華僑的勞苦工商份子，可以說是真正的平民組織，真正的國民革命黨。興中會後至民國紀元前七年改組為中國同盟會。中國同盟會至民國元年改組為國民黨，國民黨至民國三年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至民國八年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後至民國十三年改組，至民三十九年又改造一次。七十年來名稱雖幾經變更，然而革命宗旨始終如一。今天救民族救國家的責任，仍由中國國民黨承擔。黨的命運已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打成一片。這個黨乃是 國父畢生心血的結晶品。

(3) 首創中華民國 造黨是一件事，建國又是一件事。 國父組黨的目的是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在興中會誓詞中已明白提出。但在 國父開始革命的時候，民智閉塞，風氣未開，革命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呢？真是前途茫茫，毫無把握。 國父當時的意思²亦以革命救國，先要有人出來提倡，總要先有人出來犧牲，然後才能首開風氣，喚起國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至於成

功，必不自我。但是後來等到中國同盟會成立，集全國的精英，始信革命可以及身而成。

中華民國的締造，單是國父自己領導革命，已經過十次失敗，最後有志竟成，中華民國終於創立。中國歷史亦由此開始新紀元。

張季直原是不贊同革命的，及至民國十四年，國父逝世，他在南通追悼會上說：「中山先生是國民黨領袖，手創中華民國，凡是中華民國國民，誰皆應敬佩。中國以四五千年之君主政體，一旦改爲民主，在世界新趨勢則順，況以少數人倡導，則更爲困難。而中山先生不畏難，不怕苦、屢仆屢起，集合同志，謀舉革命，千折百回，備嘗艱苦，至辛亥年，卒底於成。以歷史觀，中國革命之第一人爲商湯，但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爲國體之改革，與商湯之一朝一姓之更變，迥然不同。所以中山先生不但爲手創民國之元勳，功在黨國，且爲中國及世界上之一大人物。」此言至爲確當。

二、爲世界開創新紀元 誠如張季直先生所說，國父是中國大人物，亦是世界大人物。但國父之爲世界大人物，又與一般世界大人物不同，他乃是開創世界新紀元之大人物。

在國父誕生之前，要想從中國歷史上找一個世界人物，確實很難。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閉關自守，沒有登上世界舞臺。自然不能產生世界人物，祇知講究洋務，眼光亦局限於中國自身問題，從無有人注意到世界問題，至於對世界問題具有偉大抱負和深遠眼光的，更無其人。

國父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他的三民主義以救國建國爲起點，而歸結於世界大同。他所

提倡的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不僅在救中國，建設新中國，還要進一步恢復中華民族固有地位，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可惜他革命奮鬥一生，雖然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而他所建立的民國，竟一度淪於帝制餘孽之手，不能讓他主政，將國家搞好，然後置身於國際政治舞臺之上，發揮他轉移世運的抱負。不過他所發明的三民主義却正是開創世界新紀元的明燈。

蔣總統於五十一年十一月間曾鄭重的指示說：「中國國民黨有主義、有組織、有歷久彌新的歷史，而且還可以說，現在的世紀就正是三民主義的世紀。在自由世界與共產極權國際鬭爭之中，益加證明惟有我們的三民主義，才能真正達成世界和平的願望和人類的幸福。」蔣總統認為現在的世紀，就正是三民主義的世紀，事實確是如此，毫無過言。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三民主義世紀的造成，並非是各國政治家因信仰三民主義，才創造這個世界的新紀元。乃是因為國父是近代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他所發明的三民主義，不僅為我們救國與建國的寶典，同時亦為世界各國解決本國問題及處理國際間問題必由的指針。這亦是因為三民主義不但有崇高的理想，同時三民主義所定的方法都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新趨勢而定。國父乃是站在時代的前面，指導世人，到了今天，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均為世界潮流所迫，都不知不覺的遵循三民主義指示的途徑，來處理國內外問題，所以造成三民主義的世紀。

二十世紀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交織的時代，世界各國的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無一不

導源於這三個大問題，所以要解決國內外問題，亦必須從這三個問題入手。然而今日人類世界的禍害，大多由西方狹義的民族主義，放任的民權主義及鬭爭的社會主義所造成。今天要挽回世運，拯救人類世界，西方國家對其固有主義，均非改弦更張不可。此更張之道，亦唯有實行三民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共產帝國主義勢力之侵略及其擴大，世運急變，西方國家為應付世變，不得不修正其固有的主義，以適應世界潮流，都不知不覺採取三民主義指示的原則，作為解決民族問題、政治問題及經濟問題的方針。因而今日世界上民族主義的新潮流，民權主義的新潮流以及社會主義的新潮流大都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相符。這都有事實可證，詳見拙作「現在正是三民主義的世紀」一文。

國父偉大的成就，是由一生革命奮鬥而來的。歷史上凡是成就大事業的，無不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得來，然而情形亦大有差別。如張季直先生說國父不畏難、不怕苦、屢仆屢起、千折百回，備嘗艱苦，凡是可用的讚美的形容辭，都已用上，可謂至矣盡矣。但是實在情形究竟如何？我們無法於這些抽象形容辭中獲得實在真相。而歷來研究國父歷史的學者，亦無人注意及此，誠為憾事。因而作者要在這方面加以說明。國父的奮鬥史，乃是艱苦卓絕的奮鬥史，真是同耶穌一樣，生來就是為世人受苦受難。然而耶穌受苦受難結束甚早，而國父受苦受難足足三十年。

真正以平民打天下 國父是中國歷史上真正以平民打天下的第一人，而艱難困苦，亦大多由此

而來。推翻滿清皇朝，創造中華民國的革命，乃是打天下的革命。不過過去都是爲個人打天下，國父是爲四萬萬同胞打天下。中國歷史打天下的人，亦有出身平民的，如劉邦與朱元璋都是出身平民，及至有資格參加打天下的時候，已經不是平民了。他們有地盤、有將兵。而國父打天下的時候，自始至終，是一個平民，既無地盤，又無兵將。直至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舉爲臨時大總統之前，始終是平民。

國父以十八年長時期的革命奮鬥，中間經過十次起義的失敗，始終沒有一個地盤堪作打天下的根據地。革命失敗之後，繼之流亡生活，終年奔走海外，棲棲皇皇，甚而連一個立足的地方都沒有，沒有地盤就不能有革命軍。祇有運動會黨與軍隊，用時集合，敗時解散。國父打天下因爲缺乏物質資本，所以比過去打天下的人都要難，但是國父另有一套打天下的資本，亦是任何人所不及的。這套資本可以說就是精神資本。

這個精神資本是什麼？就是吳稚暉先生所說：一是品格自然崇高；二是度量自然寬宏；三是精神自然專一；四是研究自然精博。換言之，亦即天縱之聖。有這些優越的精神資本，自然使國父成爲人望所歸之革命領袖，但缺乏必需的物質條件，自難免格外的艱難困苦。

二、二十餘年的流亡生活 國父革命的艱苦，可從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看出。流亡生活可分兩個時期：一是民國前的流亡生活，一是民國後的流亡生活。

做一個革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沒有不過流亡生活的，但亦沒有人比 國父流亡這樣長久，亦沒有人比 國父流亡這樣困苦。 國父前一時期流亡生活是自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九月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開始，直至辛亥年十一月間由歐洲返國始終止。這一段時間的流亡生活都在海外，前後足足過了十六年。這一段流亡生活，因要革滿清皇朝的命，清政府視為大逆不道，自不得不亡命海外，原為事理之必然。可是民國成立之後，這位手創民國的偉人，還要到海外和上海租界過流亡生活，却是出於常情之外。

民國二年春， 國父在日本，三月間，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死， 國父隨即自日本返上海策動討袁軍事。至十一月間各省討袁軍事相繼失敗， 國父又亡命赴日，這段流亡生活，直至民國五年六月間袁世凱帝制失敗身死而止。前後又過了三年的流亡生活。

可是流亡生活並未至此而止，民國六年八月間， 國父率領海軍南下，組織護法政府，就任大元帥，後以政學系勾結桂系軍閥反對 國父， 國父乃辭大元帥於七年五月間離粵至滬，又在上海過流亡生活，因為當時北洋政府已下令通緝 國父，如不在租界，亦難容身。這段流亡生活，至九年十一月離上海赴廣州組織國民政府才告一結束。在上海又過了二年半的流亡生活。綜計 國父自第一次廣州起義開始，至十四年逝世，前後三十年，其中過流亡生活共二十三年，沒有流亡祇有七年。

在二十三年漫長歲月中，怎樣渡過流亡生活，不要講革命遭遇種種困難問題，就是個人生活與家庭

生活，也弄得俯仰依人，真是爲國忘家。自民國紀元前十六年至紀元前六、七年一段時間，國父家人生活尚有長兄德彰先生照應，可無後顧之憂。後來德彰先生因資助國父革命弄得破產，自顧不暇，國父乃將自己的家人遷移南洋檳榔嶼居住，家用按月一百元，由當地同志五元或十元湊集接濟。至民國紀元前三年四月，當地同志不能按時送款，國父在舊金山寫信給鄧澤如說：「請兄於椰城外之各埠，邀集着實同志十餘人或二十人，每人五元或十元，按時協助家費，以抒弟內顧之憂。」由此可以看出流亡生活之處境。至於國父爲革命而奔波，一切旅費和費用，不是取給於同志，就是借款。其他籌募革命軍費與接濟同志，安頓同志，更是非錢不可，而籌款亦非易事。此中艱苦辛酸，自非三言兩語可盡。

三、不見容於流亡地政府 除私人生活與家庭生活費用無固定收入可資維持一事外，尚有各地流亡地政府不見容的問題。國父亡命到國外，乃是奔走革命，當日海外華僑甚多，正是運動革命的對象，但同時亦不能走得太遠，與國內失去聯絡，所以最適宜的流亡地，是在中國鄰近各國的地區，如香港、日本、越南等地。可是這些地方都因爲滿清政府外交交涉的結果，不允許國父居留。

香港離廣州甚近，且是國父舊時求學之地，而英國在歐洲又是最能容納政治亡命客的國家，原是最理想的流亡地。但英國對香港殖民地與本國不同。自乙未廣州失敗後，國父逃至香港，香港政府下逐客令，直至辛亥革命一年始撤銷。

日本初時尚好，進步黨要人如大養毅等與國父均有深交，幫忙國父很多。至中國同盟會成立後

，日本政府因滿清政府大施交涉，不得不接受清政府之要求，而令 國父離境。

其次是越南。國父於民國紀元前五月間赴越南河內設立祕密機關，策動兩廣雲南革命軍事，乃是改名換姓的秘密行動，及至十一月鎮南關一役，國父自鎮南關返抵河內，途中為越警察覺。即限令出境。次年十月間，國父自星加坡赴曼谷活動，暹羅政府亦限令一星期出境。

後至民國紀元前二年十月間，國父因召集黃克強、趙伯先、胡漢民、鄧澤如等重要人在庇能開會，謀在廣州大舉，又為荷蘭政府限令出境。至此，香港、日本、越南、暹羅及荷屬南洋均無地容身，不得不遠走美國。弄得在東方幾無容身之地。

四、海外保皇黨的破壞 清末革命運動外，尚發生與革命運動背道而馳的保皇運動。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因戊戌政變而相繼逃亡海外，組織保皇會，發展保皇運動。當時海外華僑革命風氣未開，康有為以帝師自命，又假託「衣帶詔」以欺矇僑衆。海外華僑靡然風從，而康氏弟子復人才衆多，分途發展，不數年間，加拿大、美國各地，英屬南洋各地、荷屬南洋各地及緬甸、暹羅，無不有保皇會的組織。至庚子前後，海外幾全為保皇黨的天下。此時 國父尚未暇注意海外發展。

革命與保皇情同冰炭，勢不兩立。其後 國父至海外奔走革命，凡屬保皇黨勢力所及之地，無不遭受打擊。因而 國父在海外奔走革命時，不但受流亡地政府之壓迫，同時亦受當地保皇會華僑的排斥。所以 國父講到庚子後的困難說：「適於其時有保皇會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運動，比之清廷為

尤甚。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幾致絕望。」可見當時海外革命運動，遭保皇黨的影響，是何等嚴重。國父向南洋各地推廣革命運動，是在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後，其後奔走於緬甸暹羅各地，雖到處受所在地政府的壓迫，不能久作居留，但以海外人心，逐漸轉向革命，同盟分會亦在各地相繼成立。至革命黨的海外報紙，與各地保皇報紙的論辯，則大有助革命勢力的推廣，惟其艱苦的奮鬥，亦非易事。革命勢力在海外逐漸抬頭，保皇勢力亦隨之沒落。

五、不斷失敗永不灰心 國父一生革命的經歷，是如何的艱苦，他的成功乃是不斷失敗，永不灰心，所以能够屢仆屢起，而終底於成。

國父一生革命，經過十次的失敗，然而每次失敗、遭遇任何困難，絕不灰心。興中會爲革命草創時期，有兩次起義。在此時期中，重要革命同志有楊衢雲、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史堅如等革命先烈幾個人。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陸皓東成仁。惠州起義失敗後，史堅如成仁，隨之是楊衢雲被刺死，鄭士良暴病而死，剩下的祇有陳少白先生一個人。陳是文弱書生，祇能辦報，不能做其他革命活動。換言之，要革命，亦祇有一國父一個人。但是國父並不因此灰心，仍是奔走海外，鼓吹革命。因爲他首開革命風氣之先，而又在海外奔走，不斷的鼓吹革命，國外與國內均受感應，革命風潮亦日盛一日，所以到了民國紀元前七年，到歐洲、有比、德、法留學界革命同盟會的發起，到東京有中國同盟會的組織，這因爲國父爲中外皆知的革命領袖，人望所歸，所以能將全國革命志士結合在一起，同盟會爲革命擴